

思想

货币史的千年规律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

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货币史,相关文献读得越多,越发认识到货币在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政治稳定两大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现代意义上的纸币登上历史舞台,是以宋朝的信用纸币“交子”之诞生为标志的。

元世祖于中统元年(1260年)印发“中统交钞”和“中统元宝交钞”。

元世祖于中统元年(1260年)印发“中统交钞”和“中统元宝交钞”。由于殷鉴不远,蒙元王朝特别制定了最早的信用货币条例“十四条款”和“通行条款”。

乱弹

“杜威击败杜鲁门”

194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简直是一场闹剧。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从竞选开始就落后。所有的舆论,历次民意调查都显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将以无可置疑的优势轻松赢得选举。

报纸发出去了,万没想到,杜鲁门笑到了最后。杜鲁门没有原谅这家报纸,他从宾西法尼亚大街街在敞篷车上,挥舞着“杜威击败杜鲁门”的头版新闻报纸,凯旋般地回到白宫。

美国舆论和美国民意就这样从来不曾真正正过。

国内的舆论也经常发出某些针对资本市场的预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只要是舆论普遍一致的看法就会引起我的警觉,总会不自然地想起“1001只白天鹅”的警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对于暂停大型新股发行一年多的沪深股市来说,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史上高居首次。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受到巨大短期收益的诱惑和面临连年对外用兵引起的财政压力,元朝政府很快就自坏成法,失信于民,短短20年后,宝钞便贬为原值的十分之一。

大凡制度一旦确立,便伴随着“制度惯性”。朱元璋虽然深知元朝倾覆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币制崩坏,但出于缓解财政压力、强化中央集权、置贵金属于政府掌控之中、降低交易成本之考虑,同时也出于朱元璋本人的自信性格,明廷于洪武八年(1375年)立钞法,颁行“大明通行宝钞”。

经过十多年北洋政府货币银行体系的混乱后,国民党执政伊始便着手整合中国银行业,并于1928年组建中央银行,且在1933年实施币制改革,“废两改元”,虽说结束了清末和北洋时期混乱愚钝的旧币制,但新制仍然以白银为支点,故其脆弱的基础依然未打牢。

从信用货币制改弦更张为金属货币制,应该讲不失为明智之举。经济白银化显而易见的优点,在于约束王朝任意创造的货币权力,切断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为市场带来相对稳定的预期,并以此鼓励投机与贸易。

宋金元三朝之灭亡与通货膨胀高度相关,而大明之倾覆又与晚明长期的通货紧缩密切相关。面对两个互相矛盾的惨痛教训,经再三权衡,满清政府全面承袭了包括明朝嘉靖年间创立的银两制度在内的明朝制度。

清代货币体系混乱带来的更为可怕的结果,是外商借机大肆掠夺清朝的巨额财富。银元输出和在华发行纸币,是其攫取中国财富的主要金融手段。

清代货币体系混乱带来的更为可怕的结果,是外商借机大肆掠夺清朝的巨额财富。银元输出和在华发行纸币,是其攫取中国财富的主要金融手段。



“三高”演唱会成了一种时尚,也成就了至今独一无二的品牌

MBA眼光

假如是趋风附雅的时尚



刘贤方

美国理工大学(NYIT)商学院副教授、终身教授,负责学校的中国MBA项目,兼任中美一些大公司顾问

世界三大男高音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1996年7月20日晚在美国新泽西巨人体育馆举行了一场演唱会。

那时我住在中西部的密尔沃基市。说实话,我音乐素养是太低,那次专程前往,完全是为了太太,她是歌剧爱好者,那三个男高音意大利语演唱的歌咏咏叹调,我既不熟悉也不懂,听着场上阵阵的鼓掌声,看着那些痴痴似醉的听众,我心里猛然涌起一种难言的孤独者的悲哀和强烈的自卑感……

我虽在美国住了20多年,但出生于上海,初一时遇上文革,下放到江西农村,在艰苦环境中锻炼了9个年头,直到恢复高考后才上了大学,后来出国,读了博士,又在大学任教。

终于,乐团奏起了我熟悉的曲调,太太用手肘碰了我一下,安慰说,快结束了。那最后一首是美国人家喻户晓的“纽约,纽约”,也是我喜欢的——后来住纽约就更喜欢了,喜欢最后一句歌词:“你只能能在纽约成功,就能在全世界成功。”并常以此来勉励自己。

这时场上掌声雷动。听众的反应显然是情不自禁、发自肺腑的,整个气氛达到沸点。突然,我也有了新的感悟:这首歌与那些歌咏咏叹调相比,当然是“下里巴人”,为什么在全体观众中却引起如此强烈反响?那瞬间我明白了,大师们在唱“阳春白雪”时,观众席上固然有知音,但不懂者可能也为数不少——原来如此!

或许我是在以“小人之心,以度君子之腹。”但假设我的推断正确,即听众中大有趋风附雅者,那我又要问:(1)如何理性地解释这种行为?(2)它又与经营管理有什么关系?

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Akerlof)在1970年发表了影响巨大的论文《市场上的“柠檬”(次品)》,促发了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他也由此而分享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这种“市场失败”(Market Failure)并非普遍存在。为什么?根据阿克洛夫的研究,只要存在着信息不完善,市场就必然会建立起反制的手段,如品牌、厂家质量担保等。

因为信息经济学,我们也更理解人类行为。现代社会也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所以才有

“知人知面不知心”的说法,所以人们会积极去寻找当信号的工具,以体现自己、传达想让人知道的信息。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博士教育本是培养研究型人才(所以才有论文的要求),在美国读博士是为了当教授和研究员,而在中国为什么那些老板、老总、甚至官员要去拿博士学位?——他们想让人知道,自己是有识之士;随着社会、技术和制造水平一定越来越好,为什么在上海却是旧式手表更加昂贵?——因

那可以彰显世家身份;而在音乐会上,除了知音者外,那些缺乏音乐素养的人为什么愿意花钱买罪受?——因为想显示自己是艺术修养的。

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这与与管理经营有什么关系?”关系重大!

耐克今天拥有世界36%的球鞋市场,绝对的市场主导,可仅十多年前,它与锐步还不相上下,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遥遥领先了。耐克的成功,在于首先推出当时看来高风险的做法:开出天价雇来明星运动员当代言人。事实证明这是一着高棋,今天已为其它公司争相效仿。

顾客为什么愿为名牌鞋多花这么多钱?球星的推崇为什么会如此影响消费主流?——因为顾客选择某一球鞋,不是为它的使用价值,而是为获取某种信号,以此体现自我意识、向往与追求——那溢价实质上是其为获得信号而付的成本,而他愿意支付这个代价,就是因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星巴克能够在世界各地成功地吧咖啡卖得这么贵,不是因为它的咖啡的质量——那不值这个溢价,而是因为它推崇的一种生活方式。

认识到了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也明白了人们需要信号来传递信息,那就可以通过满足这种需求而获得商业的成功。比如说,当《华尔街日报》明确建立起商业报纸的形象,那商界人士,以及那些想跻身于商界或伪商界人士,都会订阅这一报纸。而且,以此群体为目标客户的推销员,为了解他们的品味,也要阅读此报。

当奔驰车成功地建立起高档商务车的形象,也就成为那一族群的最佳选择,尽管媒体不时有不利奔驰车的报道,尽管常有消费者抱怨它的质量——而且这种抱怨不是偶然的,美国的《消费者报告》是产品质量调查最有权威、最可信的杂志,它对奔驰的车型竟没有一款“推荐”。可今天最流行的高档商务车仍然还是奔驰车。

早期的个人电脑,苹果与IBM的竞争代表了两种制式、两种经营理念的对抗。从结果看,苹果失败了,被IBM远远地甩到了后面。人们也多次预言苹果死亡,可它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归根结底,那是因为它牢固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形象;从事图像艺术设计的最佳工具。苹果在设计功能上,曾远远领先于IBM电脑,但现在这种差距已很小了,且对大多数的业余者来说也无关紧要。但因为这一形象,苹果就有它的专精(Niche)市场,就有人愿花更贵的钱去买。

因为市场信息的不完善,所以才能“定位”。但定位不是要你决定以何种产品打市场,那是选择细分市场和目标顾客,定位是使产品在顾客观念中建立起确切无疑的位置。唯有如此,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忠实顾客群,也才有他们无悔无怨的“愿者上钩”。

杂拌儿

一个生命与一台电脑



张晓晖

自由撰稿人,现居天津

某院士的手提电脑被抢,数日便告破案,并由此引出关于恢复收容制度的言论,据说要以“好人为本”,这个说法与“以人为本”不大一样。

日前,长沙警方调动大量警力,采取多种措施打击城区“两抢一盗”犯罪,并在街头挂出“打击飞车抢劫者 拒捕的当场击毙”字样的横幅。

值得注意的是,网上调查显示,多数人支持院士的意见,支持“拒捕的当场击毙”的也占相当比例。

网上舆论是谁非不是笔者的论题。笔者想说的几句题外话:群体的暴力与个人的权利。群体的暴力倾向是否应该威胁到个人权利?能够肆意侵犯个人权利的群体又会享有怎样的命运?

苏格拉底是在雅典的民主投票下被处死的,古罗马的角斗场上,失败者的命运由看台上的看客们决定,如果失败者的表现还有可取之处,看客们会把大拇指指向上指,失败者的角斗士就算是捡了条命,如果向下指,那失败者的头颈会当场被大铁锤砸成粉碎。表决的过程绝对民主,一人一票,童叟无欺。

我国古代对所谓淫妇的处罚很严酷,家族一般选择沉塘,装进竹笼沉到池塘里淹死;乡里则喜欢更刺激的方式,给淫妇骑木驴,脖子上还挂上一双破鞋,看客都会啐口水,以示自己的正义感和道德感。挂破鞋的传统流传到“文革”期间,另外又加上挂牌子、剃阴阳头、喷气式、站高凳子等方式。

在这样的群体暴力下,个人没有起码的生命权、财产权和尊严。

运动的时候,总是打倒5%,95%是好的,但几轮运动下来,打倒的就不止5%了,而民族也因此遭受了巨大的灾难,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道德人心上。当人们醉心于对5%的打倒、凌辱和践踏的时候,却不知道灾难也在向自己逼近,因为有人以95%的名义今天收拾这个,明天修理那个,最终必然是整个群体的被剥夺。

具体而微的个人权利没有保障,整体的权利也不可能得到保障。所以,民主在不适当的时候也会形成暴力,威胁到个人权利,最终影响到民主本身。这就是为什么一向尊崇民主的古罗马最终被凯撒和其养子屋大维的独裁所取代。屋大维被誉为“奥古斯都”(August),意思是独裁者,至高无上的掌权者。后来这个August在英语中代表8月,因为正是在8月,屋大维成了罗马的独裁者。

何况,网上调查结果不等于民主表决,仅仅是群体表决而已。因为网上调查只针对能够上网的群体,而不代表有投票权的全体。试想,如果全体奴隶参与对角斗士命运的表决,如果8亿农民参与针对所谓“无业游民”的收容制度表决,结果会怎样?

今天,经过对左倾思想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给人民带来的宽松、自由与尊严的生活。而群体暴力倾向却是一种毒瘤,它直接危害到文明社会的肌体,使得一个社会丧失法律、理性、宽容。

某院士在抗击非典时的大胆无畏令人钦佩不已,但院士毕竟只是个医学专家,他这回恢复收容制度的言论是否过于轻率了?也可能是一时气愤而言辞略显偏激。问题是炒作中的共鸣与喝彩,那个多数人赞同恢复收容制度的网上调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格外警惕。

“以好人为本”的“好人”,如何界定?谁来界定?有什么权利把“无业游民”引申为犯罪推定?人究竟有没有“无业”的权利?如果“无业”,有没有“游”的权利?退一万步说,即使把“无业游民”等同于“好吃懒做”,人有没有“好吃懒做”的权利?是否因为“好吃懒做”就要受到侵犯?

如果再换个位,被抢的不是院士,而是民工,会有这样的声调吗?会不会迅速破案?事实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农民工不得薪,被欺辱,被非法搜身,讨薪而不得。

孙志刚以年轻的性命换来了收容制度的终结,如果一台电脑(即使是手提的)又促使收容制度的恢复,那社会的天平会是怎样的倾斜状态呢?社会的良知蜷缩到哪个角落去了?

众生平等,精英不能垄断话语权,群体不能形成暴力,让每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这,应该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